

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及其原因探析

——以中英小说标题的翻译为分析中心

冯全功 枣彬吉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很多学者与翻译家认为英汉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整体上英译汉的忠实度要高于汉译英的忠实度,但并未对此进行论证。本文通过对383篇中英小说标题的翻译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不管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忠实的翻译都超过了50%,但英文小说标题翻译的忠实度(求真度)要远远大于中文小说标题翻译的忠实度,或者说后者更加务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上述观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目前中英目的语接受语境的成熟程度不同、中英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不同以及中西编辑生态与权力话语不同。

关键词:翻译方向;翻译忠实度;影响;原因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5-0125-08

0 引言

随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挑战性,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与思考也不断地深入。就翻译方向^①而言,翻译活动有传统的“译入”(外译中)形式,也出现了大量的“译出”(中译外)实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翻译市场逐步从以外译中为主,发展到以中译外为主”(黄友义,2018:5)。相对外译中而言,中译外有自己的特殊性,包括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问题。陈国华基于自己长期的翻译经验,认为“英译汉与汉译英常常实行不同的标准。一般来说,英译汉比较忠实于原文,汉译英常常不太忠实于原文”(马会娟,2008:63)。他还提到在汉译英中,译者不再扮演“忠实的仆人”角色,而是“像一个拿着手术刀的美容家,对原文这个看似无恙的‘病人’进行手术”(马会娟,2008:67)。陈国华的观点值得关注,由于翻译方向的改变,译者对待两种翻译实践的方法、策略和标准不尽相同,以致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翻译现象只是陈国华的一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研究重点委托项目“《翻译概论》学研结合教学模式探索”(TJZWWT202001)、浙江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活动暨新苗人才计划“数字人文视域下当代汉学家译者群体风格多维研究”(2023R40117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冯全功,男,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话语、翻译修辞学及《红楼梦》翻译研究。

枣彬吉,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翻译学和中国文学外译研究。

①方梦之(2004:14)主编的《译学辞典》认为翻译方向“指译者是把外语译成母语,还是把母语译成外语;也可以指把一种惯用的语言翻译成另一种惯用的语言,或把一门外语译成另一门外语”。本文使用的翻译方向主要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具体而言,也就是英译汉和汉译英两种方向,与译者的民族身份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如汉译英方向的既可以是顺向翻译(译入型的),也可以是逆向翻译(译出型的),英译汉亦然,但实际上却鲜有逆向翻译的存在。

引用格式:冯全功,枣彬吉. 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及其原因探析——以中英小说标题的翻译为分析中心[J]. 外国语文,2023(5):125-132.

面之辞还是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之中?如果确实存在,两种翻译方向下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到底存在多大差异?这种差异又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

除陈国华外,许多翻译家、翻译研究者和评论者对当下英译汉、汉译英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实践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汉译英中,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最具代表性,对他的研究也很多。孟祥春(2014)通过剖析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认为他在相对忠实的前提下,根据目的语读者的期待和需要对译文进行调整,并把葛浩文的翻译观总结为“以‘忠实’为前提,以‘可读、平易、有市场’为基本诉求,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凸显自我的‘再创作’”。也有媒体与学者把葛浩文的文学翻译视为“连译带改”式的,并强调“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理念已经过时(刘云虹等,2014)。葛浩文的诸多译本中确实存在大量不忠实现象,包括语言、文化、诗学、结构等层面的变异,是译者翻译观、目的语诗学以及出版社编辑合力的结果。还有学者对沙博理(Sidney Shapiro)、蓝诗玲(Julia Lovell)、米欧敏(Olivia Milburn)和韩斌(Nicky Harman)等翻译家的汉译英实践展开研究,结论不外乎“忠实性叛逆”(黄勤等,2016)、“忠实性再创造”(朱振武等,2015:114)、“创造性叛逆”(朱振武等,2017)等几种说法,与有关葛浩文译著的评论大体相似。针对这些不太忠实的翻译现象,国内学者基本持肯定态度,以期通过归化策略让中国文学有效地传播出去。

在英译汉中,大家对忠实翻译的态度与汉英译者不尽相同。2018年6月18日,在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举办的“新时代文学翻译的使命——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上,王理行认为,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是忠实于原作的,“不忠实,非翻译”,强调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袁筱一表示文学翻译要尊重原作,她提倡直译,反对“美化”原作的做法;郭国良认为译者要“老老实实地把原作还原出来”,如果可以,连原文的标点符号都要保留下来(许钧等,2018)。这几位翻译家都强调文学翻译要忠实于原文,尽管百分之百忠实的理想状态难以企及,但译者仍要想方设法去靠近原文,以减少偏离原文的可能性,经典作品的翻译尤其如此,如萧乾、文洁若合译以及金隄独译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20世纪末,国内曾开展过关于《红与黑》汉译的大讨论,从当时读者反馈的结果来看,“78.3%的人支持‘等值’类(翻译),仅21.7%的人支持‘再创造’类(翻译)”(赵稀方,2010:36)。由此可见,忠实翻译观在国内外译中的翻译家以及普通读者中间都是根深蒂固的。纵观当下中国的文学翻译图书市场,不难发现如果译作与原作相差甚远,出现不忠实的情况,译作极有可能饱受诟病,难以被出版界、文学界、翻译界乃至普通读者接受,甚至会面临下架和被召回的命运,冯唐翻译的《飞鸟集》就是典型的例子。

从当前中外翻译家的观点与实践不难发现,相对中译外而言,外译中的译者和读者更强调全面地忠实于原文,强调尽可能地向原文靠近。翻译批评者对两种翻译方向下不忠实翻译现象的容忍程度似乎也是不同的,对汉译英的容忍度更高。这说明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有一定的影响,冯全功(2019:116)也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但未进行深入论述。这种观点还有待证实,本文旨在从大量英汉小说标题的翻译入手来分析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探讨英译汉与汉译英的翻译忠实度是否存在差异,是否符合陈国华等人的论断。

1 英汉小说标题翻译的忠实度对比

为了证实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我们搜集相关小说标题翻译的语料,以译者行为批评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分析工具,尽可能全面、客观地去描述目前汉译英和英译汉两种翻

译方向下小说标题^①翻译的忠实度情况。之所以选择小说标题翻译作为支撑语料,主要因为:(1)标题是对整部小说最有力的概括,往往是作者不断选择、提炼后的结果;(2)作为艺术品的小说,它还兼具商品的性质,不管是原作还是译作,最先吸引读者的往往是小说的标题,所以小说标题的翻译也是译者和出版社非常看重的;(3)小说标题翻译最能体现译者的翻译观以及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4)从内容体量上来看,小说标题一般较为简短,便于研究者展开较大规模的统计和归类,从某个特定阶段对比分析英汉小说标题翻译的忠实度差异。为了凸显新千年之后的共时差异,我们只选取2000年后出版的汉英小说标题的翻译。在中文小说英译方面,根据纸托邦(Paper Republic)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资源中心(MCLC)统计的数据,选取了2000—2019年翻译出版的当代中文中长篇小说,共计183本。在英文小说汉译方面,主要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布克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当代获奖作家的中长篇小说,其中首次翻译出版的时间限定在2000—2019年,共计200本。

翻译忠实度可用周领顺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中的“求真-务实”连续统来说明。其中“求真”指的是“译者为实现务实目标而全部或部分求取原文语言所负载意义真相的行为”;“务实”则指“译者在对原文语言所负载的意义全部或部分求真的基础上为满足务实性需要所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周领顺,2014: 76-77)。二者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组成了“一个动态的连续统一体”。“求真”是翻译行为发生的必要条件,是“务实”的基础;“务实”是翻译行为发生的充分条件,因“求真”而生,并高于“求真”(周领顺,2014: 97)。译者忠实于原文是“求真的结果”,相反,译者对原文刻意不忠是其社会属性的彰显,也可视为一种“社会性行为”(周领顺,2014: 95)。“求真”强调的是译者的“语言性”,“务实”强调的是“社会性”。“求真”与“忠实”的概念比较相似,都旨在“求取语言所负载的意义之真”(周领顺,2014: 101)或者说忠实于原文的意义^②。不妨认为,如果译文标题再现原文标题语义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忠实度就越高,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就越靠近“求真”一端;如果译文标题整体上偏离了原文语义,或出现“重命名”的现象,译者行为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上则靠近“务实”一端;中间还有既“求真”又“务实”的情况。

就所搜集的语料而言,如果译文标题不增不减地再现了原文语义,我们将其归为“求真”,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被译为 *A Dictionary of Maqiao* (2003), 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被译为 *Serve the People* (2007), 冯唐的《北京,北京》被译为 *Beijing, Beijing* (2015); 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 *Oryx and Crake* 被译为《羚羊与秧鸡》(2004), 门罗(Alice Munro)的 *Dear Life* 被译为《亲爱的生活》(2014), 麦克尤恩(Ian McEwan)的 *Nutshell* 被译为《坚果壳》(2018)等。如果译文过分偏离原文,完全脱离原文的语义,即译文是对原文的改写或重命名,我们将其归为“务实”,如严歌苓的《扶桑》被译成 *The Lost Daughter of Happiness* (2001), 原文与译文在字面上明显脱节,译文中丝毫不见小说主人公扶桑的身影;韩东的《扎根》被译为 *Banished!* (2008), “banished”是动词“banish”(意为“驱逐、放逐”)的过去分词形式,语义与原文的“扎根”相去甚远,几近对立。其他典型的“务实”的翻译还有苏童的《河岸》被译为 *The Boat to Redemption* (2011)(救赎之船);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被译为 *I didn't Kill My Husband*:

① 小说集的标题一般是选集中的某篇短篇小说的标题,不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翻译亦然,译者还有可能会在文本选择上做出一定的调整,所以本文语料的选择仅限于中长篇小说的标题翻译。

② 忠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翻译研究概念,涉及不同的层次,如语言层次、审美层次、思维层次等,本文主要指语言层次,针对的是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最明显或最显著的语义信息。

A Novel (2014);斯特劳特(Elizabeth Strout)的 *Amy and Isabelle* 被译成《十六岁的夏天》(2015),原文标题由小说主人公姓名构成,而译文却围绕年龄与季节,与原文标题没有语义关联;斯威夫特(Graham Swift)的 *Last Orders* 被译为《杯酒留痕》(2009),如果严格直译,应译为“最后一单”,译文标题显然是译者的再创造,“译”的成分很少,创造的成分更多。

按照语义的忠实程度,本文暂把“求真-务实”连续统分为五个层次,其中上述的“求真”和“务实”居于两端,居于中端的则是“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以及“半务实”的状态。如果译文基本再现了原文的语义内容,只是在个别词汇的语义上出现了偏离,或者增删了个别不重要的信息,我们将其归为“半求真”,这类译文在求真度上低于“求真”但高于“半求真半务实”。如残雪的《新世纪爱情故事》被译为 *Love in the New Millennium* (2018),原文中“故事”一词没有译出,但它不涉及原文的主题,并且原文中的关键信息都被译过来了,这样的译文总体上求真于原文,忠实度也很高;王定国的《敌人的樱花》被译为 *My Enemy's Cherry Tree* (2019),译文再现了原文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译者还添加了“my”这一物主代词,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原文语义,但更符合目的语表达规范和小说的主旨;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的 *The Good Lord Bird* 被译为《上帝鸟》(2018),原文中“good”这一褒义词被删掉。如果译文只是部分再现了原文的语义内容,删减了原文中个别关键信息,或者译文在再现原文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我们都将其归为“半求真半务实”,这类译文大致处于“求真”和“务实”的中间状态。如盛可以的《北妹》被译成 *Northern Girls: Life Goes On* (2012),译者在再现原文内容的同时,为译文添加了一个副标题“Life Goes On”,体现了译者对小说主题的理解与把握;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被译为 *Running Through Beijing* (2014),原文中的小地名“中关村”被替换为国际大都市“北京”;塔特(Donna Tartt)的 *The Secret History* 被译为《校园秘史》(2007),译文里的“校园”一词是译者添加的内容。如果译文删除了原文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再现了原文的个别信息,或者译文再现了原文信息,但补充的内容更多,我们把其归为“半务实”。这类译文的求真度略高于“务实”的译文,因为它们与原文还保持一定的联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微乎其微。如苏童的《碧奴》被译为 *Binu and the Great Wall: The Myth of Meng* (2007),尽管原文在译文中得到再现,但是译者添加的内容明显多于原文,某种程度上影响原文信息的凸显;慕容雪村的《原谅我红尘颠倒》被译为 *Dancing Through Red Dust* (2015),除了原文中“红尘”这一意象得到再现之外,其他内容或删或改,“原谅”这一带有请求语气的词被删除,而“颠倒”一词,在原文中可以理解为“被颠倒”,带有“我”被“红尘”困扰之意,译文的“dancing”则带有明显的主动性;凯里(Peter Carey)的 *Parrot and Olivier in America* 被译为《主仆美国历险记》(2012),除了保留原文的地名“美国”,其他都被译者改写了。由此可见,“求真”“半求真”“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和“务实”这五种状态的求真度或忠实度是逐渐递减的。根据所搜集语料,具体统计结果如下:

表1 中英小说标题翻译的求真度和务实度统计对比

译者行为特征	求真	半求真	半求真半务实	半务实	务实
中文小说标题英译	41.5%	8.7%	16.4%	13.1%	20.3%
英文小说标题汉译	76.0%	9.0%	5.5%	4.0%	5.5%

由上表可知,在“求真”上,英文小说标题汉译远远高于中文小说标题英译,在“半求真”上,两者的差别不大,在“半求真半务实”“半务实”和“务实”上,中文小说标题英译明显大于英文小说标题汉译。总体而言,英文小说标题汉译的求真度要高于中文小说标题英译的求真度,或者说中文小说标题英译的务实度相对更高一些。“求真”和“半求真”都不妨视为忠实的翻译,两者相加的话,不管是中文小说

标题英译还是英文小说标题汉译,忠实的比例都超过了 50%(前者为 50.2%,后者为 85%),体现了文学翻译对语义忠实的普遍诉求。由此可见,汉译英的求真度也大于务实度,所以不宜过分夸大其中的不忠实性,只是其务实度相对英译汉更加凸显或者不忠实的现象更为常见。如果说忠实是翻译的常规,偏离或不忠实的译文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注意而已。中英小说标题翻译的忠实度对比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陈国华等人的观点,也就是英译汉的忠实度整体上大于汉译英的忠实度,翻译方向(英译汉与汉译英)对翻译忠实度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尤其是文学翻译。

2 英译汉与汉译英忠实度差异的原因分析

翻译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存在,要从整个漫长的中西翻译史来探讨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很难操作,尤其是从实证层面,何况翻译体裁(如宗教、科技、社科、文学)也会影响翻译的忠实度。因此本文选取 2000 年之后的一个横截面,来探讨英译汉与汉译英文学翻译忠实度的共时差异。就中英小说标题的翻译而言,这种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英译汉的忠实度明显高于汉译英的忠实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

2.1 目的语接受语境的差异

中国从晚清开始大规模了解西方,五四运动更是掀起了“全盘西化”的浪潮,时至今日中国对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了解程度远远大于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这就为接受西方文学作品提供了充分的语境。西方世界在明清时期通过传教士也翻译过一些中国典籍,但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作品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化的兴趣,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更是如此。除了个别译者,很难有主动译介的兴趣与动力,尤其是从出版社层面而言,鲜有主动引入版权的,虽然近些年也有所改变。谢天振把目的语接受语境的差异主要归为“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所谓时间差,指的是中国人全面、深入地认识西方、了解西方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而当代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是最近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的时间罢了”;“所谓语言差,指的是操汉语的中国人在学习、掌握英语等现代西方语言并理解与之相关的文化方面,比操英、法、德、西、俄等西方现代语言的各西方国家的人民学习、掌握汉语要来得容易。”(谢天振,2014:8-9)其实“语言差”不仅涉及语言掌握难易程度的问题,还有相对数量的问题,也就是目前中国的外语专家(西方主要语种)要比相关西方国家的汉语专家多。这种“时间差”和“语言差”在汉语世界(中国)和英语世界(以英美为代表)表现得更为突出,也更有说服力。英语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远远比汉语在西方的普及程度高,再加上很多中国读者对英语文学作品本身已经比较熟悉,所以对英语作品有着强烈的“原汁原味”的期待。接受语境成熟的话,译者倾向于直译,忠实于原文,并全方位地引进文学作品的异质因素,满足读者的期待。接受语境不太成熟的话,译者或出版社会通过有意操纵,在语言和文化层面迎合目的语读者以及诗学规范,特别注重译文本身的可接受性。目前中国对英语文学作品的接受语境已经比较成熟,译者的行为集中在“求真”上。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语境还远非成熟,译者的行为偏向于“求真”基础上的“务实”,为了迎合译文读者,不忠实的成分与因素相对更多一些。中英小说标题的翻译即为明证。

2.2 中西文化的强弱关系

虽然文化强弱是个相对的概念,但由于英语帝国主义的存在,相对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化无疑处于弱势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

的,但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还相对有限,由于语言障碍以及译介力度有限,很难彻底地传播到西方国家。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往往采取俯视的态度,后者则往往仰视前者,所以“就翻译方向而言,强势文化译介弱势文化中的作品时,对忠实度的预期和要求相对较低,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中的作品往往奉若神明,亦步亦趋的更多”(冯全功,2019:116)。不管是译者心态还是目的语读者心态,基本上都是如此。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对作家也有很大影响,与英语作家相比,中文作家在世界文学场域中整体上处于边缘位置,积累的象征资本有限。毫不夸张地说,鉴于目前会用英文写作的汉语作家微乎其微,如果想要提高自己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话语权,还得主要依靠翻译。大多知名当代汉语作家不会英语或知之甚少,对于译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著作往往采取放任的态度。就目前全球性的文学评奖评价体系而言,几个主流的文学大奖,如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布克文学奖和卡夫卡文学奖等,话语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这意味着只有通过翻译,中国作家的作品才有机会被他国读者了解阅读,才有机会与他国文学交流互鉴甚至同台竞技,才有机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彩,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象征资本与国际影响力。苏炜曾谈到《迷谷》英译本的出版就花了三四年,先后在美国几大商业出版社之间流转,但都以出版的商业价值不高而婉拒,最后由一家独立出版社出版;王安忆《长恨歌》英译本的出版也有类似的经历(韩帮文,2020)。这其实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西方世界译介与传播的一个缩影,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葛浩文也谈到过自己多次碰壁的情况。相比之下,英语作家的作品在向中国译介的时候,由于本身处于强势文学这一特殊地位,再加上译介过来的作家往往获得过国际大奖,这于中国自身的文学系统而言,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所以出版社往往竞相出版,甚至不惜花巨资引进国外小说版权,然后再找相关译者进行翻译。同样,这一客观现实无形之中也会影响中国译者的文化心态,继而影响他们的翻译策略。他们往往仰视英语作家,希望把他们的作品原汁原味地翻译过来,在语言层面也谨小慎微,以促进两国文学之间的交流,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

2.3 翻译出版的编辑权力与生态差异

覃江华等(2015:77)指出,在不同的出版体系中编辑的话语权力不尽相同,在中国出版体系中,作者享有很高的权威性,而编辑的地位却普遍较低;在西方出版体系中,编辑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对文稿的修改与完善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翻译出版亦如此。在中国,许多国外经典的文学作品最先通过国内的专业翻译出版机构译介过来,如译林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些出版机构已经掌握了一套完整的图书翻译出版流程,拥有精通双语甚至多语的编辑来协助、监督译者完成翻译,对译文忠实度的要求非常高。译林出版社的编辑王理行曾说,“工作时我有个习惯,就是编辑任何人的稿子,刚开始肯定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把原文跟译文对照几遍”(许钧等,2018:6),确保译文经得起读,也经得起对照。西方出版社基本上没有通晓汉语的编辑,编辑的注意焦点并不在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上,而是更看重译文本身的文学性、可读性以及诗学规范是否符合西方读者的预期等。国外译者对中国文学作品译介过程中的很多偏离原文的不忠实现象是在译文编辑的建议下进行的,译者与编辑、作者共同决定了译文的面貌。葛浩文称其为“回顾式编译”,也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部分承担起编辑的职责,与目标语编辑合作,对中国文学在结构、语言,甚至风格等方面进行显性编辑或操纵,是更高度上的‘连译带改’”(邵璐,2016:107)。压缩篇幅、精简文字、调整结构、改变情节的现象在葛浩文的译本中颇为常见,如莫言的《丰乳肥臀》、姜戎的《狼图腾》等即如此。小说标题最容易引起目的语编辑的注意,所以中国文学外译中标题被改的情况较多,尤其是那些毫无艺术特色或者文化蕴含量浓厚的中文小说标题,如李锐的《旧址》(被译为 *Silver City*)、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被译为 *Daughters*)

of the River),这些标题翻译“都是出版商的主意,葛浩文只能妥协接受”(孟祥春,2015:81)。周领顺等(2018:110)也研究过西方编辑对译作生成的影响,认为“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尤其突出,与中国编辑相比,西方编辑的主体性更加凸显”,尤其注重译文本身的可读性与可接受性,干预也更多一些,形成了编辑与译者、作者之间的“共谋”。鉴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比较“冷门”,西方出版商与编辑对中国文学作品的权力还表现在其能决定译作是否能够出版,很大程度上掌握着生杀大权,所以译者迁就编辑的地方很多。西方编辑的业务素质往往很高,熟知目的语读者的需求,大多译者也倾向于配合,或对译文进行折中处理,包括一些中文小说标题的翻译。中国出版社对西方文学名著竞相出版,也包括新近的获奖作品,编辑的话语权不大,除了意识形态方面,对译文往往不做过多的干预,尤其是宏观结构层面。负责任的编辑则花很大的精力核实译文是否忠实,这也无形中强化了译者的翻译忠实观。

3 结语

通过对中英小说标题翻译的统计对比分析不难发现,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确有一定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学者关于英汉翻译中存在忠实度差异的论断,也就是目前英译汉的忠实度要高于汉译英。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不只是体现在小说标题翻译上,还可以从语言、文化、诗学、语篇结构、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验证,有待继续对其进行深入探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目的语接受语境的成熟程度不同、中英文化的强弱与国际影响力不同以及中西编辑生态与权力话语不同。除了翻译方向,影响翻译忠实度的因素还有很多,如译者的翻译观(翻译个性)、翻译体裁(文学与非文学)、传播渠道(口译与笔译)、他译与自译、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以及跨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等(冯全功,2019:115-116)。由于本文限定在小说标题翻译,并且该翻译出自众多翻译家之手,所以这些因素在本文中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探讨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也可以从英汉之外的其他语种组合着手,尤其是文化地位以及输入与输出悬殊较大的语种组合,还可以从历时探讨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以发掘其多重影响因素,充分认识翻译的动态性、历史性、社会性与复杂性。如果存在跨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翻译方向对翻译忠实度的影响就不会消失。随着西方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了解逐渐深入,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逐渐增强,翻译方向对英汉翻译忠实度的影响也许会越来越小,也不排除将来有逆转的可能性。所以不宜把目前西方译者对中国文学的归化处理方式视为“灵丹妙药”,尤其是针对未来的译介实践而言,毕竟尊重差异、保留差异是文学翻译的本质诉求,跨文化双向交流越频繁、越成熟,对异质因素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中国文学作品外译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 方梦之. 2004. 译学辞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冯全功. 2019. 翻译忠实观:争议与反思[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109-119.
- 韩帮文. 2020. 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最大瓶颈在翻译——专访北美“新移民”作家苏炜[N]. 中华读书报,2020-02-12.
- 黄勤,刘红华. 2016. “忠实性叛逆”:沙博理之文学翻译观[J]. 外国语(4):111-115.
- 黄友义. 2018. 服务改革开放40年,翻译实践与翻译教育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时代[J]. 中国翻译(3):5-8.
- 刘云虹,许钧. 2014. 文学翻译模式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关于葛浩文的翻译[J]. 外国语(3):6-17.
- 马会娟. 2008. 论汉译英的标准:有条件的忠实[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63-68.
- 孟祥春. 2014. 葛浩文论译者——基于葛浩文讲座与访谈的批评性阐释[J]. 中国翻译(3):72-77.

- 孟祥春. 2015. Glocal Chimerican 葛浩文英译研究[J]. 外国语(4):77-87.
- 覃江华, 梅婷. 2015. 文学翻译出版中的编辑权力话语[J]. 编辑之友(4):75-79.
- 邵璐. 2016. 蓝色铅笔下的编译——论回顾式编译法在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中的运用[J]. 中国外语(5):106-111.
- 谢天振. 2014.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1):1-10.
- 许钧, 谢天振. 2018. 新时代文学翻译的使命——“浙江大学文学翻译名家高峰论坛”纪要[J]. 东方翻译(5):4-11.
- 赵稀方. 2010. 《红与黑》事件回顾——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话之二[J]. 东方翻译(5):33-37.
- 周领顺. 2014.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周怡珂. 2018. 西方编辑之于译作形成的影响性——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西方编辑观述评[J]. 外语学刊(1):110-115.
- 朱振武, 刘文杰. 2017. 汉学家韩斌的“创造性叛逆”——以《金陵十三钗》的英译为例[J]. 外文研究(2):50-57.
- 朱振武, 唐春蕾. 2015. 走出国门的鲁迅与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蓝诗玲翻译策略的当下启示[J]. 外国语文(5):108-115.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ranslation Direction on the Degree of Faithfulness and Its Reasons: Centering on the Translations of Titl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ovels

FENG Quangong ZAO Binji

Abstract: It is held by many scholars and translators that translation direction exerts an influence on the degree of faithfulness, or to be specific, on the whole the degree of faithfulness of E-C trans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E translation. This paper confirms this hypothetical argument by investigating the translation of 383 titl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ovels, which finds that the degree of faithfulness of the titles of English novel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itles of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lthough more than 50% translations of both directions are faithful. Such a translation phenomenon occurs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urrent Chinese and English receptive contexts, between the global cultural influence of China and English countries, and between the eco-system and discursive authorit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ditors in publishing indust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direction; degree of faithfulness; influence; reasons

责任编辑:陈宁